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Sociology in 21st Century



#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C91  
185  
:2

# 西方社会学理论

## 下卷

###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杨善华, 谢立中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ISBN 7-301-10086-8

I. 西… II. ①杨… ②谢… III. 社会学-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0611号

**书 名:**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

**著作责任者:**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086-8/C·03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3.75印张 413千字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前 言

本书是我们正在编写的多卷本《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中的第三卷(即上、中、下三卷中的下卷)。本卷是以我们以前编写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书为基础,对该书进行删减、修订和补充而成的。

目前为社会学理论界较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种看法,是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诞生以来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是自社会学的创立到20世纪初期,主要内容是各种经典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如实证主义社会学、诠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等)逐渐形成,为社会学后来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第二个大的阶段则是自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内容是帕森斯以早期的社会行动理论和后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对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的尝试,和各种反帕森斯派理论(包括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主义、拟剧理论、现象学的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的形成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分裂局面。第三个大的阶段即是自20世纪中后期迄今,主要内容一是各种“新综合”理论(如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新冲突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或“生成结构主义”理论等)的兴起,二是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大争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相关理论(如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吉登斯和贝克等人的“新现代性”或“自反性现代性”理论、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等)。我们正在编写的这部多卷本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大体上即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展开。其中上卷主要介绍和讨论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卷主要介绍和讨论帕森斯和各种反帕森斯学派的理论,下卷则主要介绍和讨论20世纪中后期以来迄今为止的各种“新综合”理论以及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有关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

2005年初,我们完成并出版了本套教材计划中的上卷,目前正在编写中卷和下卷。考虑到《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内容上大体上与本套教材中计划的下卷相吻合,加之出版社正在准备重印此书,希望我们在重印前加以修订,我们遂决定以此书为基础,按照上述三卷本的计划和要求,对其进行删减、修订和补充,使其能够先行出版。主要的工作是:删除了原书中“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两章(按照上述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分期的理解,这两章应该挪入到本套教材的中卷中去),增加了介绍和讨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自反性现代性”理论、布希亚的社会理论、鲍曼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三章。删改、补充后的本书,除了篇幅有所增加外,内容也相对更加完善些。

本书的编写方针和原则与上卷相同。一是期望能够写成一部既能够作为教材、同时又带有一定学术研究性质的作品,二是每位作者文责自负,主编只负责确立全书的整体框架、协调编写工作、通读全书并在内容和文字上做必要的把关工作。

和已经出版的本书上卷及《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样,由于人力和能力上的限制,本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水平方面都有着许多局限。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随着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进展,来不断地修订和完善本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再次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5年10月3日

# 目 录

前 言 .....	(1)
<b>第一章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b>	<b>林 彬(1)</b>
第一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 .....	(1)
第二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	(6)
第三节 法人行动与现代社会结构 .....	(14)
第四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影响及评价 .....	(20)
<b>第二章 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 .....</b>	<b>谢立中(28)</b>
第一节 学术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基本思路 .....	(28)
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方法论 .....	(32)
第三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 .....	(35)
第四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结构理论 .....	(37)
第五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过程理论 .....	(40)
第六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变迁理论 .....	(45)
第七节 简要评论: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与局限 .....	(48)
<b>第三章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b>	<b>阮新邦 尹德成(56)</b>
第一节 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 .....	(57)
第二节 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悖论 .....	(60)
第三节 “生活世界”、“系统”与理性化过程 .....	(65)
第四节 “生活世界”殖民化 .....	(70)
第五节 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一个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 .....	(74)
<b>第四章 安东尼·吉登斯 .....</b>	<b>李 康(85)</b>
第一节 吉登斯的生平与学术历程 .....	(85)

第二节	吉登斯思想的基本态度 .....	(89)
第三节	结构化理论基本原则的展开 .....	(93)
第四节	吉登斯的现代性分析 .....	(104)
第五节	吉登斯思想的对象与源泉 .....	(110)
<b>第五章</b>	<b>乌尔里希·贝克 .....</b>	<b>郑 莉(119)</b>
第一节	贝克其人及主要著作 .....	(119)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 .....	(120)
第三节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 .....	(128)
第四节	全球化与世界社会 .....	(136)
第五节	结语 .....	(143)
<b>第六章</b>	<b>皮埃尔·布迪厄 .....</b>	<b>李 猛(151)</b>
第一节	布迪厄的学术生涯与思想渊源 .....	(151)
第二节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 .....	(157)
第三节	实践理论 .....	(164)
第四节	语言与符号暴力 .....	(172)
第五节	对布迪厄理论的评价 .....	(180)
<b>第七章</b>	<b>诺伯特·埃利亚斯 .....</b>	<b>李 康(193)</b>
第一节	动荡年代的坚定一生 .....	(193)
第二节	文明化的过程 .....	(198)
第三节	过程性视角的发展 .....	(207)
第四节	投入与超脱:知识的社会生成 .....	(213)
第五节	整体过程观照下的人类发展 .....	(218)
第六节	“过程”社会学——原则与影响 .....	(222)
<b>第八章</b>	<b>米歇尔·福柯 .....</b>	<b>李 猛(232)</b>
第一节	福柯的生平与思想渊源 .....	(233)
第二节	真理的体制:话语的考古学 .....	(240)
第三节	监狱与性:权力的谱系学 .....	(246)

---

第四节	自我、权力与知识：批判与反抗 .....	(257)
第五节	福柯的影响与评价 .....	(264)
<b>第九章</b>	<b>让·布希亚 .....</b>	<b>夏 光(279)</b>
第一节	导言 .....	(279)
第二节	商品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 .....	(285)
第三节	模仿世界中的定局与对策 .....	(303)
第四节	结语 .....	(317)
<b>第十章</b>	<b>齐格蒙特·鲍曼 .....</b>	<b>郑 莉(330)</b>
第一节	鲍曼其人及主要著作 .....	(330)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	(332)
第三节	后现代性的描述性分析与批判性质疑 .....	(341)
第四节	结语 .....	(355)



## 第一章

#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林 彬

理性行动理论(又称为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学派,目前这一学派在西方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中有很广泛的影响。理性行动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它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这一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和社会经济学家贝克尔。科尔曼在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为这一学派建立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本章主要对这部著作加以介绍和评述。

## 第一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

### 一、科尔曼的学术经历

科尔曼(J. Coleman)出生于1927年,1949年获美国普度(Purdue)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5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在研究生期间的指导教师有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毕业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60年代他创建了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关系学系,任系主任和社会学教授。1973年他返回芝加哥大学任教,一直到1995年去世。

50年代以来科尔曼发表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论著,如对美国工会的民主制度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载于他与李普赛特、特罗合著的《工会民主》一书,

1956);对医生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医药的创新》,1966);对中学教育制度的研究(《青少年社会》,1961)等等。他的成名作是60年代出版的《数理社会学入门》(1964)和《教育机会的平等》(1966)。前者介绍了当时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数学模型;后者是受美国教育部门委托进行的政策研究报告,即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一报告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有重要影响。70年代在继续对教育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之外,他发表的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社会的权力与结构》、《纵向资料的分析》等。80年代初,他与贝克尔共同主持了“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研讨课,这一课程因其跨学科性质和对各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享有盛誉,吸引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参加。1989年科尔曼创办了学术刊物《理性与社会》,作为研讨跨学科理论问题的论坛。这一时期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80年代以前科尔曼是以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专家著称,在学术方向上是遵从他的导师们所开创的传统,即布迪厄所嘲讽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神圣同盟”。由于这种调查统计与结构功能理论相结合的主流社会学在70年代以来招致各方面的攻击,因此科尔曼开始有意识地探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所创建的“理性行动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并使他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他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93年他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共同主编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较全面地介绍了90年代社会学理论的流派和前沿课题。

## 二、科尔曼的理论和方法论倾向

科尔曼创建的理性行动理论在方法论上主要针对主流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而不是解释个体行为,但系统行动是间接地来源于众多的个人行动。他指出,对社会系统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整体方法论,另一种是个体方法论,他主张采用后者。因为以往的整体方法论是侧重“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sup>(1)</sup>,如对各个国家的自杀率与政治变迁进行因素分析,或对某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分析。这种整体方法论由于忽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并因此受到各种微观社会学派的攻击。

科尔曼所主张的个体方法论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他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这种个

体方法论不同于心理学和某些行为科学的个体方法论,即不是仅仅依据个人动机和倾向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而是要考虑由个人到系统的多个层次,然后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为社会系统水平的现象虽然与个人行动有关联,“但是这种现象既非凭借个人意愿产生,也不能依据个人行动进行预测”<sup>[2]</sup>。

另外,结构功能理论是在系统行动的层次上应用社会目的论或功能论进行解释,这容易导致循环论证和宿命论。而理性行动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但它对于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因而避开了目的论或功能论的循环论证。另一方面,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是既考虑到个人行动的原因是要满足个人的利益,又考虑到个人在人际交往、在群体、组织、制度中的行动是受到后者制约的,并在种种制约下选择适当的行动方案,这就避开了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两个极端。

在理论视角上,理性行动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它不同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假设,也不同于韦伯科层理论的“组织人”假设。科尔曼认为,“社会人”假设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人是社会系统中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他只是被动地按照规范行动;同样,“组织人”假设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分析,个人只是像机器似地履行他的岗位职责,这种假设忽视了组织中的个人动机和利益结构。科尔曼也不赞同某些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是用人类的文化观或价值观来直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而忽略了从人的观念到系统行动之间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重要元素<sup>[3]</sup>。

理性行动理论是以“理性”(rationality)这一概念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这一假设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sup>[4]</sup>,行动者是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理性”(或有目的性)与“效益”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含义,这就使“理性人”假设不同于“经济人”假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的(如团结)、文化的(如道德规范)、情感的(如友谊)、政治的(如权威)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sup>[5]</sup>。

理性行动理论既不企图涵盖也不排斥其他理论视角。科尔曼指出,他之所以选择“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行为假设,一是为了提高理论的预测能力,二是

有利于保持理论的简捷。这样就有可能像经济学分析那样建立数学模型,并使用这些模型进行定量研究<sup>[6]</sup>。他认为,以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试图解释大部分社会行动,但是这种假设并不是说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所有有目的的行动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尽管科尔曼在其著作中很少对其他理论进行评价和褒贬,也很少在抽象层次上介入各种理论和概念之争(这与他注重经验研究的背景有关);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其理论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主要有:(1)社会学的交换理论。(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3)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对规范和法规的分析。(4)近期发展的博弈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有助于推演出演绎性和形式化的理论,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互动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的形成,有助于从基础层次上对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作出解释;这些理论的关注点是与科尔曼的理论目标相近或相符的。这也是他将其著作定名为“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原因之一。

在理论形式上,科尔曼和贝克尔都借用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但两者有很大不同。贝克尔是直接应用一般均衡分析和“理性预期”理论来研究人口、家庭、婚姻、利他主义等等社会行为<sup>[7]</sup>,科尔曼则是从社会学角度扩展了理性选择模型,并在分析方法上借鉴了交易费用分析、产权(或法规)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在以往的理论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是不同的。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在各种行动中作出选择的,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社会学则研究人为什么无法选择某种行动”。80年代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都出现了试图将个人与结构(或产权)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行动的发展趋势。科尔曼的理论正是要研究人的理性行动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在结构的限制中人们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作为社会学家,科尔曼不是直接套用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而是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社会关系理论、组织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等等)引入到理性选择模型中,以此扩展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作为经验研究专家,科尔曼并不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次,而是致力于发展一种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数学模型。

### 三、理性行动理论的目标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有三个主要目标:(1)提供一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

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以此将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结合起来。(2)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说明社会系统中微观与宏观相互过渡的各种途径,从而以演绎性、形式化的理论预测和解释社会系统的行动。(3)深入、全面地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人行动。

社会科学理论都要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系统的行动作出解释,由此形成了各种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科尔曼认为,目前各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普遍存在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联系十分脆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或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他以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来说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sup>[8]</sup>。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宏观社会命题:新教的宗教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成。尽管韦伯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离不开人的行动,但在他的理论中却未能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众多个人的行动又是如何形成资本主义宏观体制的。科尔曼指出,韦伯的理论解释只停留在系统水平上,如果要将宏观水平与微观水平联系起来,就要对韦伯的命题进行修正。修正的方法是将这一命题分为三个命题:(1)新教教义改变了某些个人的价值观念。(2)这些改变了价值观的个人采取了一定的经济行为。(3)这些个人的经济行为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成(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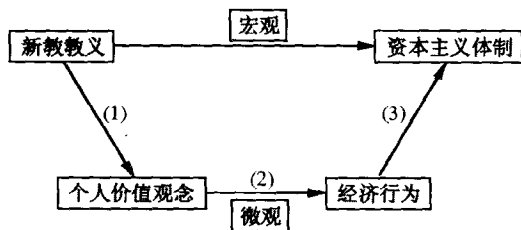


图1-1 社会理论的命题结构:宏观命题与微观命题的联系

科尔曼认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基础,阐述系统行动的理论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与图1中的三类命题相对应。这三个部分的理论作用分别是:(1)说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社会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个人特征的因变量组成。(2)说明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成。(3)说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社会特征的因变量组成。这样,理论体系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宏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了个人水平。

理性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不包括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

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科尔曼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各种类型,以便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他将社会行动分为两大类:(1)交换行动。(2)法人行动和规范性行动。前者如企业的销售行动,后者如教徒们去教堂祈祷;它们都涉及对许多人产生外部影响的集体行动。

交换行动涉及行动者之间交换资源或权利,这种交换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外部影响。交换行动可划分为三小类:(1)市场交换。这里的市场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市场。(2)权威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把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转让给另一行动者,如球员服从教练的行动。(3)信任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单方转让自己的资源或权利给另一行动者,如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另一个人购买股票。以上三种类型的交叉还会形成四个小类<sup>[9]</sup>。

科尔曼的这部百万字的理论著作就是沿着上述行动结构展开的。全书分为五编、三十四章。第一编介绍基本的行动和关系;第二编分析交换行动的几种形式,并对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进行讨论;第三编分析法人的行动;第四编讨论现代社会与法人行动的问题;第五编建立了分析各种社会行动的数学模型。

## 第二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与他的侧重宏观—微观联系的主旨相适应,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系统行动包括三方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法人行动。

### 一、基本行动的要素

#### 1. 行动者、资源和利益

科尔曼对社会行动者的定义借鉴了经济学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并且都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资源”的种类很多,如财富、物品、事件、信息、技能、特长、感情等等。行动者与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行动者仅仅通过两种关系与资源(间接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即控制资源和获利于资源。行动者只有一个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sup>[10]</sup>

行动者的利益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的,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

的需要和偏好。科尔曼对利益并没有下精确的定义,但他区分了两种自我的利益:(1) 客体自我,它涉及人的感受和满足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人的行为动机。但是对客体自我的利益很难加以观测。(2) 行动自我,它服务于客体自我,努力使之感到满意,就如同人手的行动抓到了一只苹果,使自我感到满意一样。行动自我的利益是可以观测的,它表现为获取对于事件控制所必需的资源数量。两种自我的关系可比喻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sup>[11]</sup>。

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这样,最基本的行动是两个行动者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双方的利益,这也是人际互动或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起因。基本行动是任何行动系统的基础,两人的社会交换也是一些社会理论(如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的基础,科尔曼正是以此为基点来扩展他的理性行动理论。

## 2. 社会最优状态

通过对行动者和基本行动的定义,科尔曼参照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引入了“社会均衡”和“社会最优状态”的概念。“社会均衡”是在多次交换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行动者之间的交换是使双方都获利而又不受损失,这些利益在交换之前是无法得到的;如果这些交换稳定在某种状态而不再改变交换形式或交换比率,那么社会就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由于不同的交换率和每个人的获利比率不同,所以社会均衡点可以有多个。“社会均衡”不是平均状态或理想状态,而是一种相对状态,即相对于不稳定、不均衡的交换而言。一般来说,处于均衡状态的交换比起交换之前的资源分配所达到的利益满足程度要高。“社会最优状态”是在一定系统中最佳的社会均衡状态,它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联系。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自动地(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牵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或社会最优状态。在社会系统中,最优状态有许多种,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行动系统(或区域),每一系统都有自己的最优状态;在有些系统中,还存在着多个最优点(类似于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科尔曼指出,引入这两个概念,一是为了对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状态进行衡量和评价,二是为了像经济学那样构造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sup>[12]</sup>。

## 3. 行动的权利

社会交换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因为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并非是自然而然的或毫无疑义的。这就需要建立行动的权利结构。权利可分为“自由(处置)权”和“要求权”,权利结构规定每个行动者对何种资源有自由处置权或

利用这些资源采取行动的权利。例如,规定奴隶主是否有用他的奴隶交换其他物品的权利,规定吸烟者是否有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权利。通过对吸烟权的讨论,科尔曼指出,“权利既依赖权力,又依赖他人的承认”。权利结构是由行动所涉及的所有人共同决定的。行动者可以依靠强力或影响力强制其他人承认他的要求,也可以依靠共识,形成规范,使“有关他人”承认他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社会共识和权力分配。“社会的承认是权利存在、消失以及转让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实施必须以权力予以保证。”<sup>[13]</sup>

## 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行动者之间除直接的交换关系、人际(情感、互助)关系外,还存在着与系统行动有关的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这些关系界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它们可以说明众多行动者的基本行动是如何转变为系统行动的。

### 1. 权威关系

科尔曼对权威关系的定义是: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和乙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也就是说,行动者乙将自己对某些资源或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行动者甲,从而建立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的关系。权威关系可分为两种类型:(1)共同的权威关系。即被支配者转让控制权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获益。但支配者并不直接用自己的资源换取控制权,而是通过承诺使被支配者预期到未来的利益而转让控制权。如工会、政党领导人的权威。(2)分离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支配者行使权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被支配者服从权威是为了直接获得某些补偿。这种关系类似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是,被支配者付出的不是物品,而是对自己的某些资源(如能力、时间)和行动的控制权。如企业领导人、行政长官与雇员、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sup>[14]</sup>。

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威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共同的权威关系中,主要的问题是支配者超范围地行使权威,使被支配者失去过多的控制权而受损,这就涉及如何监督支配者,使其在必要的范围内为实现一致利益而行使权威。另一问题是由于被支配者未直接获得失去控制权的补偿或他对预期利益的估价较小而不服从权威。因此,共同的权威关系的维持与加强既取决于双方有较多的、一致的长远利益,也取决于双方对权威范围和一致利益的共识。在分离的权威关系中,主要问题是被支配者的消极行动(如怠工)会损害支配者的利益。要有效地监督被支配者的行动就需要建立监控系统和赏罚制度。另一问题也是支配者超范围地行使对被支配者的控制权,例如雇主对雇员的性



骚扰<sup>[15]</sup>。

## 2. 信任关系

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他们的行动目的都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信任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源委托给受托人使用，以便得到比不存在委托关系时更大的利益。委托人在建立信任关系时要考虑三种因素：受托人确实可信的概率(P)、如果受托人不可靠所造成的损失(L)、受托人确实可信所得到的收益(G)。委托人的决定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型。对受托人而言，由于他在接受信任时已经获得了利益(使用他人的资源)，所以他在以后面临的选择是：违背诺言还是讲信用。对他的选择有影响的因素，一是他本人的道德观念，二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科尔曼指出：“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还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sup>[16]</sup>。这种社会结构的形式主要有较持久的互赖关系和内部联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经验研究表明，在两人的短暂联系中，受托人违约的概率更大。但在持久的互赖关系中，受托人一次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小于他失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同样，在联系密切、信息交流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受托人如果违约，他也将失去其他组织成员的信任。

## 3. 复杂关系：权威系统与信任系统

由两个行动者的简单关系发展到多个行动者的复杂关系标志着由微观互动到宏观结构的转变，因为复杂关系不仅涉及超出两个人面对面互动的间接关系，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如权威结构、市场结构等)。不仅如此，科尔曼认为，由复杂关系形成的社会结构还表明了系统行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微观互动、微观到宏观(结构)的转变、宏观结构对微观互动的影响<sup>[17]</sup>。

以权威系统为例，任何社会都会从简单权威关系发展出各种权威结构，这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通过权威结构，才能提供行动者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如法律、安全保障等)。与简单的权威关系相比，复杂的权威结构是由三种角色构成的：支配者(也称权威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代理人，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如国家领导人授予各级行政官员一定的职权，企业主给各级经理一定的管理权，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因为两者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因此，如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控和激励是现代组织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中是被忽视的。

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这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和微观互动形成了社会